



重读《吕梁英雄传》

铭刻华北抗日历史的光辉一页

□杨文婷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晋绥根据地军民携手抗战的长篇小说,在抗战文学中独具特色。1945年6月,《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到1946年8月刊登完毕,共95回。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这部作品连载80周年。在小说中,康家寨这个小村庄的民众配合八路军开展对敌战争,一个个平凡的乡土人物焕发出英雄光彩。故事发生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创立,不仅是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屏障,亦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吕梁英雄传》讲述的康家寨故事称得上是共产党领导下军民联合抗战的史诗,写下了华北抗日历史的光辉一页。

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的周文在为这部小说作的序言中说,《吕梁英雄传》写的是“咱晋绥边区眼面前的事情”,具有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的特点。这部作品以吕梁山区为背景,不仅生动反映军民战时生活,也细致描写当地自然风貌、民情风俗。作为“新英雄传奇”的代表性作品,它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体现了大众化的趣味和风格,至今读来仍仿佛身临其境,令人重返那个充满紧张艰险又不乏乐观明朗的历史年代。

衣食皆是军民情

马烽、西戎都是山西人,《吕梁英雄传》源自他们对当地乡土、人情的感受与体验。1938年春,马烽参加抗日游击队,随军转战太行山、吕梁山一带。其间赴延安学习再返回晋绥抗日根据地,参加当地文艺工作团。1942年,西戎从延安返乡,担任区抗联文化部长。1944年,马烽、西戎双双调到《晋绥大众报》工作,为合作创作小说提供了契机。两人辗转吕梁山一带数年走村访户,曾为村民调解矛盾、立约写信,还把纺织技术传授给村妇以改善村民生活。八路军的抗日游击队能在乡土扎根,军民之间经历了一个互帮互助到建立深厚感情的过程。晋绥根据地老百姓的无私馈赠和关怀,最令人难忘。西戎在《我迈出的第一步》一文中提到:“特别是在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和敌军遭遇,我掉队以后得到群众关怀的一段经历,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

故事的发生地康家寨,位于吕梁山区的支脉桦林山下。那里林木繁茂,物种多样:“山上到处是高大的桦树林,中间也夹杂着松、柏、榆、槐、山桃、野杏;山猪、豹子、獐子、野羊时常出没。”然而当地日常物资匮乏,尤其冬季气候特别严寒,北风凛冽,白雪皑皑覆盖山脉。日军侵略打破了康家寨原本的宁静,村民们愤恨侵略者却又无力可施、一忍再忍。直到八路军的武工队派出队员武得民到康家寨发展民兵,待到时机成熟一举打倒日军扶持的村维持会,这里才终于迎来摆脱压迫的希望。

虽然康家寨群众平日缺衣少食,此前又遭受日寇压榨雪上加霜,但村民们心怀感恩、慷慨地为战士们提供衣食,彰显出深厚的互助情谊。隆冬时节,乡亲们纷纷给武工队准备热乎可口的饭菜:“到中午时,家家都在烧水做饭,准备招待武工队……人们都插到队伍里,争着往自己家里叫人。”抗属康大婶的儿子外出参加八路军,她对待前来的武工队队员仿佛看到亲人归来一般:“忙把已经做好的白面条、炒好的鸡蛋,一碗一碗摆在老武同志面前,劝吃劝喝。那股亲热劲儿,真如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突然回来一般。”康大婶看到武得民鞋子破了,从箱子底取出一对珍藏的毡窝子鞋。这种鞋厚实保暖,是当地防寒的特别冬鞋。吕梁山地区地势较高,植被茂盛,老百姓都喂养牛羊。他们选取优质羊毛作为原料,将其打成捆,经过抽打、挤压、揉搓、卷干等工序制成毡窝子鞋。康大婶虽然也做了冬鞋,自己却舍不得穿。眼见武得民鞋子被烂单薄还要冒着风雪放脚,她毫不犹豫地拿出压箱宝:“孩子,看你那鞋烂的,把这双鞋穿上,不然放哨把脚要冻坏啦!”在村民们看来,八路军赶走了侵略者、带来了幸福生活的希望,也成为与他们同吃同住的亲人。

巧造石雷保生产

在抗战中,康家寨不仅生活物资匮乏,也面临缺乏枪支弹

药的严峻问题。《吕梁英雄传》里的民兵不仅就地取材造石头地雷,而且带领老百姓一起开展石雷战。他们一次次击退日寇的偷袭和扫荡,保护了村里春耕、秋收等农事活动,反映了军民巧用乡土资源、劳动互助的历史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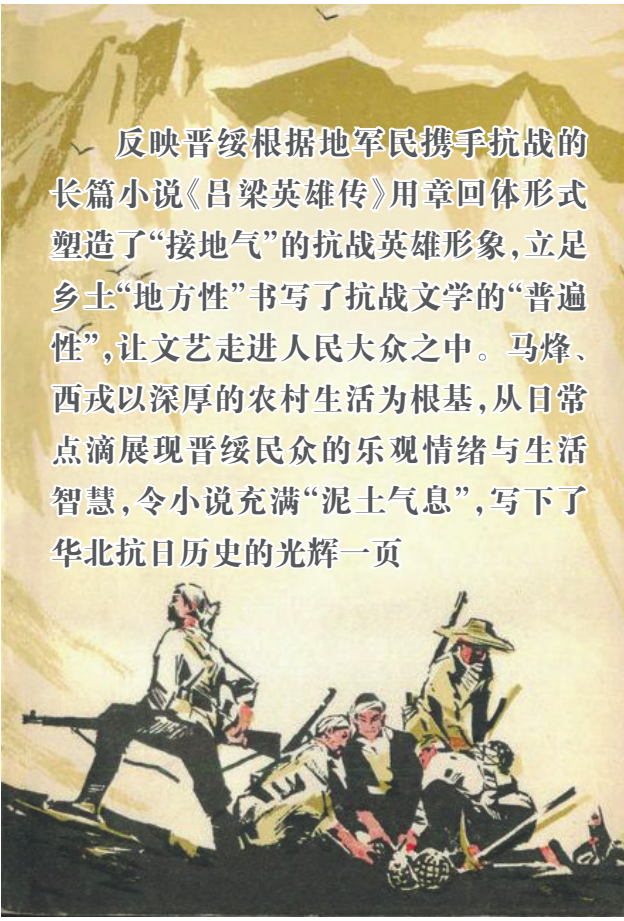
马烽、西戎担任《晋绥大众报》编辑期间,曾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召开的群英大会上,采访自制石雷的李有年等一批民兵英雄。按他们的说法,这些素材“就象春潮一样在我们的胸中鼓荡着”(《〈吕梁英雄传〉的写作过程》),转化为了生动的文学故事。在小说中,雷石柱、孟二愣、张有义、康明理、李有红等民兵,都是在康家寨出生、长大的青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为了克服缺乏武器的困境,利用桦林山的丰富石矿资源发明了石头地雷。民兵队长雷石柱最早考虑到用石头制作地雷,他善于观察,建议效仿土法:“你们看石匠敲大石头,都是钻下窟窿,用炸药炸,那么大石头一下就炸开了,咱们闹的小一些,保险更能炸碎,还怕打不死敌人!”不过,制造石雷过程并非水到渠成,也涉及军民如何沟通协调、连通情感。有一次,民兵张有义疏忽了起雷的事,意外导致康天成老汉放羊时手受伤,几只羊还被炸死。老汉对张有义大声埋怨斥责,两人都有了火气最后发生了争吵。后来康天成老汉被伪军劫掠,还要被拉去充丁。在危急时刻,张有义和战友奋不顾身救下他,还保住了羊群。康天成感激不已,也认识到民兵是真为村里做事:“你们救了我的命,今天我可认识了民兵的用处啦!回去,我老汉杀只羊慰劳你们!”小说没有简单地把民兵们塑造成“高大全”的完美英雄形象,而是在突出个性特征的基础上,接地气地还原了这些农民出身的民兵真实面貌。

在小说中,民兵造石雷与康家寨的劳动生产紧密结合,呈现具有地方农事特色的景致。进入秋季,吕梁山一带漫山遍野的庄稼如金浪翻涌。日寇瞄准丰收季节前来“扫荡”,企图大肆抢粮、破坏秋收。康家寨的民兵、村民组织起来,一起连夜抢收庄稼,齐心合力埋地雷。在“快收快打快藏”的号召下,出现了不分昼夜抢收庄稼的火热场面:“男人妇女白天集中力量割,夜晚往野场里背、打,沟里梁里到处是抢收的人们。”待到“扫荡”队伍开到康家寨,村民早已藏好粮食,躲进了深山沟里。日伪军进村后不知深浅高低,在各个地点触发了埋藏的石雷。随着一声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敌人们吓破了胆,创膏的不敢创了,抢东西的不敢抢了,抢到的也吓得丢了,满街乱窜嚎叫。石头地雷的威力虽不如先进技术造出的枪炮,却是康家寨全体军民因地制宜创造的武器,凝聚了民间智慧,在家园守卫战中发挥威力,鼓舞了斗志。就像村民们口占的打油诗:“此物生来性子强,十字路口把哨放,鬼子胆敢动一动,送他地狱游一趟。”

斗智斗勇筑联防

桦林山不仅石头资源丰富而且林木茂密,引发日寇的觊觎。为了抵抗敌人的抢劫,更为了预防他们修路之后长驱直入进山扫荡,康家寨与其他村庄展开了联防战。《吕梁英雄传》围绕本土资源争夺,涉笔康家寨周围乡村的战时情况,呈现出多个村庄守望相助、共同抗敌的壮丽图景。

吕梁山地区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却阻挡不住侵略者的野心。日军发现汉家山有煤矿,就计划着修建一条从康家寨通往汉家山、水峪镇的铁路,以方便进山掠夺。为了获取修建铁路的枕木,他们又打上桦林山里木材的主意。桦林山的树木属于康家寨以及桃花庄、望春崖三村共有,村民们发觉敌人的阴谋后,急忙互通消息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抢先一步砍桦林,再将木材锯成细碎木块,彻底破坏日军修铁路的计划。然而,对长久居住在山里、靠山生活的村民而言,亲手毁掉朝夕相处的树林是多么痛苦的事。小说以细致的笔触抒发村民们对桦树林的热爱:“人们都记得,每年夏天,这林子长的多么俊秀,多么的茂密呀!花儿红,叶儿绿,树枝交叉着树枝,人们做活做累了,便钻到这凉飕飕的林子里,采野果子,歇晌午。”一些老人一方面不忍亲手糟蹋林木,一方面害怕日军恼羞成怒来报复,犹豫着不同意砍桦林。眼看时间紧急,人心不齐,又是民兵队长雷石柱站出来耐心劝说。老人们才终于意识到,一旦铁路修成,不止木料,山区



反映晋绥根据地军民携手抗战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用章回体形式塑造了“接地气”的抗战英雄形象,立足乡土“地方性”书写了抗战文学的“普遍性”,让文艺走进人民大众之中。马烽、西戎以深厚的农村生活为根基,从日常点滴展现晋绥民众的乐观情绪与生活智慧,令小说充满“泥土气息”,写下了华北抗日历史的光辉一页

所有的物产乃至各人的性命安危,都将被敌人牢牢掌控。

宁毁桦林,不予盗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村民们怀着守卫家园的决心,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恨,冒着三九严寒砍桦林。大伙儿不再情绪低沉而是充满干劲,散布到山里的各个角落,像太平年打围场一样挥斧抡锯。每两人围住一棵大树,或锯或砍,三丈高的桦树应声倒,“斧声、锯声、人声,霎时响彻山林,那声音真好似六月天发山洪一般。”整座桦林山好像发生地震似的震荡:“桦树一棵一棵地往下倒,飞溅着雪花;山雀野鸡,惊叫着四处乱飞。”当敌人气急败坏地前来袭击,武工队队员武得民率领民兵利用地势展开联防战,卡住山的细腰路,借助雪天山路难行进行阻击,打得日伪军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在八路军武工队的领导下,三村联防不断扩大活动范围,防御敌人来袭,并且抓准时机主动出击。他们潜入日伪军驻扎的汉家山发展民兵,又假扮日军捉拿汉奸、劝说伪军反正,还在夜里破坏公路、切断电线。最终,几个村庄的民兵合围碉堡,成功将日军挤出了据点。从犹豫到坚定,从人心不齐到共筑联防,显示了晋绥军民在困境中不失乐观、将抗战进行到底的韧性与决心。

马烽、西戎深谙吕梁山一带的气候特征、地方风物,通过文学创作生动描绘晋绥根据地军民共同体形成、壮大的动态历史过程。他们以章回体形式塑造“接地气”的抗战英雄形象,立足乡土“地方性”书写了抗战文学的“普遍性”,让文艺走进人民大众之中;他们以深厚的农村生活为根基,从日常点滴展现晋绥民众的乐观情绪与生活智慧,令小说充满“泥土气息”。他们的文学经验从抗战年代的烽火中走来,从晋绥地方走向全国各地。《吕梁英雄传》问世80年间已有多个版本的平书、连环画、电视剧、电影、民族舞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作品,称得上是形塑了“具有全民性的大众文艺形态”。马烽和西戎的文艺实践,以其鲜明的人民性与深植时代土壤的在场性,构筑了独特的“英雄传”谱系。他们以人民为主体的创作立场、扎根日常生活的文艺实践,是值得后世薪火相传的宝贵文学精神,在新时代仍具重要的承续价值。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报告”与“文学”的生动互文

——读报告文学《筑梦路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

□王 晖

等现场原生信息,查阅施工日志,在作品里保留了工程现场的粗粝质感。该方法突破传统田野调查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将文学现场延伸至地下数十米的施工核心区,为书写重大工程的报告文学提供了新鲜经验。

《筑梦路上》不是简单的地铁建设报告资料汇编,而是有着丰厚意蕴的文学文本。全书13章有着明晰的叙述分工,前半部分主要是对无锡地铁1—5号线建设过程,即地铁“硬实力”的描述;后半部分则主要聚焦无锡地铁的党建、文化、历史等,分别呈现其组织力与文化“软实力”。诗意交融的内里是作者心中的浓密乡愁,在再现地铁建设的同时,作者念念不忘对无锡的水乡古韵、工业遗产、历史文脉等标志性元素进行深度描摹,譬如梁溪老井、惠山古镇、梅园站点与荣德生历史的勾连,等等。在作者笔下,地铁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成为承载城市文化“乡愁”的独特符号。与江南名城无锡的深厚底蕴和现代气质紧密相连,二者形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相互成就的生动“互文”。

没有田野调查的深入细致,就没有“报告”;没有人物的传神描摹,就没有“文学”。对人物的艺术化再现,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报道的重要分水岭。《筑梦路上》对地铁建设的纪实,是建立在对百余人物群像的生动再现基础之上的。各色人物构成多维立体的“人物画廊”,包括地铁建设的各级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一线工人及其亲朋好友等在内的人物群体,以个体故事折射集体奋斗历程,凸显新时代中国建设者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 论

见性、见心、见情、见真

——评杨献平散文集《中年纪》

□徐 虹

杨献平的散文特质是见性、见心、见情、见真,翻开《中年纪》,西北风裹挟着黄沙扑面而来,这是巴丹吉林沙漠赋予他的精神胎记。十七载戍边生涯,让他的文字既烙印着北方民族的豪迈血性,又浸润着边塞诗的苍凉底色。当人到中年迁徙至成都,地理空间的位移带来的是关于疾病、爱情、精神等生命体验的变化,在《抑郁记》《混沌时刻》等篇章中化作深刻的自我剖析。在《边塞军旅或青春的巴丹吉林里》,青春岁月被风沙蚀刻,那些在荒漠中与孤独对峙的日夜,那些用诗歌自我疗愈的時刻,最终凝结为文字中的精神钙质。地域经验与生命体验的深度融合,使杨献平的散文呈现出独特的风致。

《中年纪》收录的15篇散文,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当代中年人的生存镜像。从《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到《成都笔记》,空间转换背后是精神还乡的永恒母题。当作者在异乡街头体会“丝丝入扣的孤独”,在《中年的乡愁》中写下“故乡是精神的标识”,他所体会到的地理与心理的双重漂泊感,恰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共同的精神境遇。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言:“写作靠的是深情。”杨献平敢于直面灵魂的暗处,在《误药记》《混沌时刻》中的自我剖白呈现出他中年后对疾病和死亡的深刻思考,让文字获得了穿透人心的力量。

在语言层面,杨献平实现了方言土语与文学表达的有机融合。他以南太行方言为精神底色,将乡土叙事与现代性思考熔铸一炉,创造出既具地域辨识度又富哲学深度的语言风格。当下有些散文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和技巧的繁复,而少质感、骨感和力道。但杨献平的文字没有精致的辞藻堆砌,坚持用“笨拙”的真诚来写散文,以生命本身的重量撼动人心,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写作姿态。深厚的感情和审美的体验让他的散文是可读可感、可思可想的,更有温度有态度、有能量有生命的。

散文写得好不好,与作家的学问、才情相关,也与作家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思想内涵的深刻性相关。正因如此,杨献平的散文有很强的辨识度,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刚健的活力。当我们翻阅《中年纪》时,触摸到的是一行行朴素而真诚的文字,执着于在现实的裂缝中寻找人生的意义,点亮精神与理想的光芒。正如他所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也是整个宇宙的。”

(作者系云南省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写一台机器的呐喊,写一颗地脚螺丝的颤栗

□老 井

我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喜欢上文学创作的,那是颇具特质的浪漫主义年代。当时我中考落榜,正在一家多种经营公司下辖的建筑队里当小集体工,落榜的心情绝对不是仅仅靠冲天一喊就能够解决的,好在我找到了一个长久的释放通道,那就是文学。在建筑队干了五年以后,我应招到煤矿下了井,为的是能够活到一个国营工的身份。地面的活再重,总能见得了天。而井下环境狭小,施展不开身子,干起活来磕头碰脑,空气中粉尘很大,呼吸都不顺畅。以前老以为自己在建筑队时干的活是最重的,但在井下的劳动强度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前段时间和霍俊明老师交流时谈到这些事时,他说:“越是艰苦的环境精神生活越是重要,需要支撑。”矿工们大都有着自己释放的通道,方式不一样,但效果却差不多,皆有曲径通幽之妙。

大家有的喜欢喝酒,有的喜欢打牌,有的喜欢“蒙两嗓子”,而我有空就想写点东西。说是业余爱好也行,说是精神支柱也不过份。我认为这些都是爱好,只要不危害社会,也不存在高低之分。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写了下来,已经有40多年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也有一些心得。我开始喜欢散文、小说,后来迷上古诗词,进厂工作后,又爱上了新诗。一开始学习时,我研究的是艾青、臧克家等诗人的作品,为他们诗中的情怀所深深打动,他们年轻的面孔和从青春的口中吟出的沧桑之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次下班出厂时我听到了有线广播里正在播出北岛的《回答》,立刻入了迷,呆果站在原地直到听完才踩着浓稠的夜色回家。后来我接触到了第三代诗人,喜欢上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品。有段时间对海子的诗歌特别沉迷,在每周一天的歌班时苦读加仿写。那时最渴望的就是能看到书,仅有的几本诗歌刊物都被我翻得稀烂。最开始,写诗的题材、风格和语言都比较杂,有人生感悟,也有风花雪月,或者一味地追求抒情,或者一味地追求语言,一味地追求张力和陌生化。我在矿下工作多年,自己出了好几次工伤,亲眼目睹了一些事故以后,愈发觉得矿工的不容易,作品的素材和风格渐渐也转向以描写煤矿特别是井下的工作生活为主了。

诗歌该如何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逐渐地我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刚开始在席慕蓉、汪国真等人的诗集大卖时,我就受到了启发:诗歌首先应该让人看得懂,才能走入寻常百姓家。对于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包括国内的一些学院派代表诗人的作品,我曾非常喜欢并疯狂地模仿过。有时身边的家人和工友们会狠狠地敲我一锤子:你写的诗都看不懂,还叫什么诗,并举出唐诗宋词的例子。我当然是会反驳的,可冷静下来想想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唐朝时“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这样的作品肯定能够流传下来。流行并不代表肤浅,我常常思索,如何能够把作品写得既好看,又具备深刻的思想性。我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要富有想象力。我一直赞成百花齐放,认为所有流派皆有佳作,所以各家各派的特长都想吸收。我认为新诗发展到现在可以包容百家,但不能变得越来越象牙塔化,只有深度接地气,不设置阅读障碍,创作出既好懂又深刻的诗,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我只有初中学历,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所限,再加上平时没有条件读书、游历,写不出常年在空旷处工作的石油业诗人的那种特有的开阔来。有些老师说我的作品逼仄,只写井下劳动场面,我虚心接受批评,同时也想为自己“辩解”几句:我的作品中煤炭题材只占到总数的五成多,其中至少有一半不是纯粹写井下劳动场面的。我写煤矿地面的物象、亲人、工友和煤矿各种人物命运的作品并不少,也有将以上物象串联在一起写的诗歌。比如2024年第1期《诗刊》上刊登我的7首煤矿诗只有2首是纯粹写井下的,也不仅限于劳动场面。其余的5首虽都涉及煤矿题材,但并没有只局限于井下。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因特定身份而刻意自我设限,工业题材的作品有时就是一台机器的呐喊,或者一颗地脚螺丝的颤栗,多写劳动场面也是一种必要的呈现。我深知自己的作品肯定有局限,因为知识面、生活面和工作面都太狭窄了,先天不足造成后天难以涉足开闢地,所以就一直想往深处去。只要还写一天,我就会竭力地扬长避短、提高自己。

在生活中碰到某些令人感叹的情境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某些古代名篇,但现当代新诗就不多了,或许和我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我想,现代新诗要能接近或达到这种效果,何愁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呢?

(作者系煤矿井下工人、诗人)